

母亲受教育水平与青少年子女主观幸福感

——来自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证据

吴林林 徐若飞*

内容提要 青少年幸福感缺失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母亲受教育水平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未能显著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母亲的高学历背景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改善了家庭教育环境和模式。但母亲高学历背景带来的主观教育倾向（“高学历教育倾向”和“全面发展教育倾向”）使青少年子女承受了较大的学习压力，抵消了正向提升效应。此外，母亲陪伴时间的减少也是青少年子女缺乏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母亲学历 高等教育扩招 青少年子女 幸福感

一 引言

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状况的综合评价，是生活的最终追求（Frey & Stutzer，2002）。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幸福感水平不仅关乎个体当下的生活质量，也影响未来的人生轨迹。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幸福感与个体的重要发展指标密切相关。从短期来看，拥有较高幸福感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好的学业适应能力（Suldo et al.，2013）、更融洽的人际关系（Proctor et al.，2009）以及更低的风险性行为倾向（Bergman & Scott，2001；Gillham et al.，2011）。从长期来看，幸福感有助于青少年在成年后拥有更健康的体魄（Bursztyn et al.，2019）、更好的职业发展（Kansky et al.，2016）、

* 吴林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linlinwu@163.sufe.edu.cn；徐若飞（通讯作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ruofeixu@aufe.edu.cn。本文系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批准号：2024AH050007）的阶段性成果。

更高质量的婚姻 (Marks & Lambert, 1998) 和更满意的生活 (Lyubomirsky et al., 2005)。

但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10~14岁儿童中有13.5%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并且这一比例在15~19岁儿童中进一步升高至14.7% (WHO, 2023)。根据Li et al. (2024) 发布的相关数据,在中国,约有64.6%的13~18岁青少年认为自己的幸福感一般,高达14.4%的青少年认为自己的幸福感偏低。以上数据凸显了探究青少年幸福感缺失原因的重要性。

学者普遍认为,升学竞争压力是青少年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Sun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20)。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高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增强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青少年因此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周子焜等, 2023; Calarco, 2018; Gu, 2021)。然而,除了外部经济和制度性因素外,导致青少年幸福感缺失的原因也源自家庭内部。其中,父母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的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高学历父母拥有更丰富的家庭资源 (刘生龙、胡鞍钢, 2018; 张抗私、史策, 2020) 和更科学的育儿理念 (吴贾等, 2020; Coleman, 1988; Cui et al., 2019)。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的。另一方面,高学历父母也对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 (张川川、葛润, 2024)。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高教育期望容易转化为子女的学业压力 (Ang et al., 2009; Liu, 2018; Lu et al., 2021)。此外,父母的学历背景与家庭地位和劳动供给密切相关。高学历背景通过影响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可能造成家庭 (或代际) 冲突 (Zhang, 2012), 也可能通过劳动供给渠道减少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上述负面因素对青少年子女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 (Almond et al., 2018; Currie & Almond, 2011; Ren et al., 2025), 引发了代际“教育-幸福”悖论。这也使得研究父母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中国教育环境下父母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因果效应,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特别地,本文聚焦于母亲高学历背景的代际溢出效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母亲承担着教养子女的主要责任。相较于父亲,母亲与青少年子女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为频繁,在日常教育和情感支持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杜凤莲等, 2023; Cuartas, 2022; Harding et al., 2015)。因此,本文认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为了准确识别因果效应,本文借助中国大规模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以解决母亲高学历的内生性问题。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双重压力下,于1999年实施了全国范围的大学扩招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中国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由1998年的108万增至1999年的160万,增长了近48% (Zhong, 2015)。在此后的2000-2002年,中国大

学新生录取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扩招政策于1998年10月被提出,1999年8月被采纳,并于同年9月起开始实施。因此,借助这一外生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本文可以有效识别和估计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因果效应(Li et al., 2017; Wan, 2006)。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地区潜在扩招能力和出生队列的双重差异,构造了母亲学历的工具变量,并使用基于工具变量的两步处理效应模型(two-step treatment effects model, TS-TEM)进行估计。研究发现,母亲高学历并未显著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知,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为了探究基准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本文基于性别异质性分析发现,母亲高学历对男孩和女孩的幸福感知均无显著影响。通过进一步剖析潜在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母亲高学历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改善了家庭教育环境和模式。然而,高学历母亲的主观教育倾向(包括“高学历教育倾向”和“全面发展教育倾向”)却给青少年子女带来较大的学习和心理压力,抵消了正向的幸福感知提升效应。此外,本文还发现,母亲陪伴时间的减少也是青少年子女缺乏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既往文献已证明母亲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学业成绩、受教育水平、认知及非认知能力(Black et al., 2005; Cui et al., 2019; Grossman, 2000; Holmlund et al., 2011; Lundborg et al., 2014; Oreopoulos et al., 2006)。然而,母亲学历是否同样可以提升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知尚待研究。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考察相对较少,且均基于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难以解读为因果效应(Ge, 2017)。因此,本文旨在评估母亲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因果效应,从而将母亲人力资本的代际溢出效应拓展至主观幸福感知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从物质生活条件、家庭教育环境与模式、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氛围和谐度以及代际陪伴时间等多个视角,全面揭示了母亲高学历背景影响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内在机制,并从劳动经济学视角为探究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知缺失的原因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知既存在正向提升效应,也存在反向抑制效应。首先,相较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高学历母亲拥有更稳定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Carneiro et al., 2011),从而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多物质资源。其次,高学历母亲更重视教育。Cui et al. (2019)发现,具有更高学历的母亲能够为子女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吴贾等(2020)的研究发现,耐心的母亲更倾向于采用科学的教育方式来教导子女,而科学的教育

方式能够减少子女对学习的抵触情绪，有利于提升子女成长阶段的幸福感。

此外，高学历母亲更懂得陪伴对于子女成长的重要性（Coleman, 1988; Daly, 2001）。一方面，高学历母亲更有能力将子女带在身边，降低子女沦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石智雷、宁桃丽，2024）^①。Chang et al. (2019) 和 Wu (2015) 的研究指出，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交流和关怀，更有可能出现自闭或抑郁情绪。另一方面，高学历母亲由于对科学育儿知识具有更强的甄别和理解能力，也更加注重代际互动。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母亲高学历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受。然而，除了上述幸福提升效应，母亲的高学历背景也能够降低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受。首先，高学历母亲对子女的学习要求更高。刘杨和蔡宏波（2020）、张川川和葛润（2024）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低学历父母，高学历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适当的教育期望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增强学习信心。然而，过高的教育期望既可能表现为“高学历教育倾向”，例如让子女参加过多的课外辅导班或家教，也可能表现为“全面发展教育倾向”，例如为子女安排过多的才艺类培训班（Ang et al., 2009; Lu et al., 2021）。

其次，高学历背景也能够通过影响家庭氛围，进而对子女幸福感受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表明，高学历能够显著增强女性的经济独立性（Becker, 1981）和家庭议价能力（Davis & Greenstein, 2009; Lundberg & Pollak, 1996）。这不仅减少了婚姻对于高学历女性的经济价值，也增强了她们应对离婚相关问题的能力（Hoem, 1997）。这些因素使得高学历女性在面临家庭分歧时选择“坚持自我”的机会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可能引发家庭冲突、降低婚姻稳定性，最终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受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Akee et al., 2018; Amato & Afifi, 2006; Cesarini et al., 2016）。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推论的成立通常以其配偶（父亲）不愿意“让步”为前提（Schwartz & Han, 2014）。此外，高学历还赋予母亲更成熟的认知能力和问题解决技能（Amato, 2010）。若这些能力最终能够沉淀为一种“长远思想”和“全局意识”，那么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则有助于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最后，尽管高学历母亲更加注重代际陪伴和互动，但她们能否拥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子女却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学历母亲认识到陪伴对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子女（Sayer et al., 2004）。另一方面，高学历母亲更可能拥有一份收入高且稳定的工作（Harmon & Walker, 1995），而“高收入”和“稳定”往往与“低灵活度”相关。因此，母亲的高学历也可能减少代际陪伴时间。

① 高学历母亲也可能因外出工作的需要被迫离开子女，从而增加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本文将在后续的机制分析部分进行相应的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其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正向与反向作用机制的强弱对比。同时,本文将逐一检验上述机制是否存在,以全面、深入地剖析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路径。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个体、家庭及社区层面的工作、教育、健康、收入等信息。CFPS基线调查始于2010年,覆盖全国25个省份、16000个家庭。此后每隔两年开展追踪调查。在CFPS调查中,10~15岁和16~17岁受访者分别被纳入少儿库和成人库,二者的问卷内容存在较大差异。为了统一刻画子女特征,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0~15岁的青少年。

(二) 结果变量:子女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测量主观幸福感:第一种为“生活满意度”或“自评幸福感”,第二种为“享乐主义幸福感”。前者代表个体对生活的综合感受或评价(Diener, 1984; Dursun & Cesur, 2016; Graham & Nikolova, 2015),后者则指个体日常所经历的各种情感的性质,即快乐、兴奋、忧愁、悲伤、生气等情绪的频率和强度(Angelini et al., 2015)。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的代际溢出效应。这要求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刻画也要基于一定时期内生活各方面满足感的总体评价。因此,本文采用第一种方式定义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具体而言,本文基于题目“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构建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由于该问题仅在CFPS 2010年、2014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共5轮调查中涉及,本文使用上述5期数据的混合样本构建数据集。在CFPS不同年份的调查中,主观幸福感问题的设置略有不同。在CFPS 2010年调查中,有关幸福感的问题为李克特5级量表,得分为1~5;而在CFPS 2014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调查中,则被调整为11级量表,得分为0~10。数字越大均代表越幸福。上述主观幸福感量表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各种社会调查,并且既往文献已证明基于此量表构建的主观幸福感指标的可靠性和有效性(Akaeda, 2020; Dursun & Cesur, 2016; Vanassche et al., 2013)。

本文使用CFPS 2014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提供的11级幸福感量表的原始

得分刻画青少年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为了降低测量误差带来的影响，也为了消除不同年龄青少年对于幸福感知和评价能力的系统差异，本文进一步构造了经年龄标准化的幸福感得分（CFPS 2010年、2014年、2018年、2020年和2022年）。其中，各期年龄标准化幸福感得分=（原始幸福感得分-各年龄组孩子的平均幸福感得分）÷各年龄组孩子幸福感得分的标准差。

（三）关键解释变量：母亲学历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母亲的学历。若母亲的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则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四）样本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进一步对数据做了如下限定。第一，仅保留受访时年龄超过22岁的母亲。第二，将母亲的（潜在）高考年份限定在1987-2010年之间，即以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年份（1999年）为中心，向两侧分别延伸12年。第三，剔除代际年龄差在15~50岁区间以外（Cui et al., 2021）以及母亲（潜在）高考时年龄不足13岁的异常值。第四，剔除观测值过少的母亲出生年份和高考户籍地省份，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最终，本文样本包含6914名10~15岁青少年，共9973个观测值。

表1展示了本研究结果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男孩比例为52.5%，平均年龄为12.44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8.3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0年，其中7.0%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10~15岁青少年子女的平均幸福感得分约为7.29。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学历母亲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差异，本文根据母亲是否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将样本分为“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并给出子女主观幸福感原始得分和年龄标准化得分的核密度曲线。如图1所示，相较于低学历母亲，高学历母亲的青少年子女并未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此外，高、低学历组样本的平均幸福感原始得分分别为7.25和7.83。上述组间直观比较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并未有效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受。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0~10）	9973	7.294	2.465
年龄标准化主观幸福感	9973	0.020	0.983
孩子性别（男性=1）	9973	0.525	0.499
孩子年龄	9973	12.435	1.704
孩子汉族（是=1）	9973	0.875	0.331
母亲年龄	9973	38.350	4.490
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9973	6.802	4.596
母亲最高学历大学及以上（是=1）	9973	0.070	0.256

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母亲（潜在）高考时具有农村户口（是=1）	9973	0.923	0.266
1998年各区（县）不受高考扩招政策影响的群体中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者的占比	9973	0.008	0.016
母亲出生时所在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9973	5.880	0.637
母亲出生时所在省的每万人病床数	9973	19.634	6.990
母亲出生时所在省的每万人医生数	9973	10.815	4.24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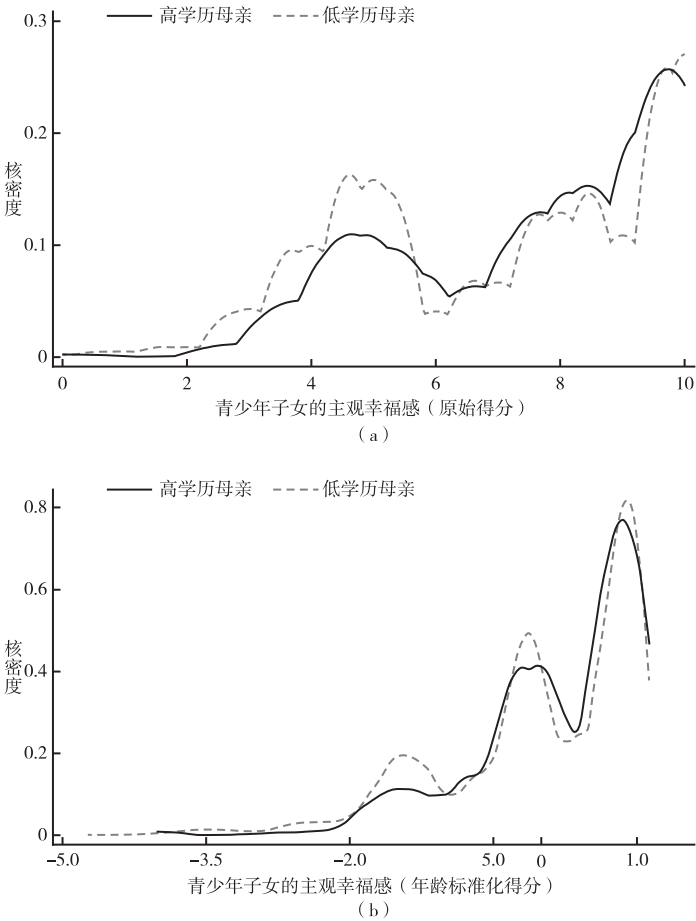


图1 青少年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图

注：绘制核密度曲线时采用Epanechnikov核函数，选择最优带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绘制得到。

四 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母亲高学历背景如何影响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本文构建如下线性模型：

$$y_{ikpgt} = \beta_0 + \beta_1 mhedu_{ikpgt} + X'_{ikpgt} \delta + \pi_k + \theta_p + \theta_p \times C_k + \omega_t + \varepsilon_{ikpgt} \quad (1)$$

其中，下标 i 代表子女， k 、 p 、 g 、 t 分别代表母亲的出生年份、高考户籍地省份、（潜在）高考年份以及调查年份。 y_{ikpgt} 为子女的主观幸福感， $mhedu_{ikpgt}$ 为母亲学历。 X_{ikpgt} 代表子女、母亲及区域特征。其中，子女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民族（汉族=1），母亲特征为母亲高考时的户口类型（农村户口=1），用以代理母亲高考时的家庭收入状况。区域特征方面，本文首先控制了高考扩招政策实施前一年（1998年）各区（县）不受高考扩招政策影响的群体中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比例，用以捕捉政策实施前本地（区/县）人口上大学概率的地区差异。其次，为进一步剔除各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母亲出生时所在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每万人病床数及医生数（Ma, 2019）。 π_k 、 θ_p 和 ω_t 分别为母亲的出生年份、高考户籍地省份和调查年份固定效应。此外，由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也可以同时影响子女幸福感及母亲上大学概率，本文进一步控制了高考户籍地省份线性队列趋势 $\theta_p \times C_k$ 。

由于环境、基因等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母亲的上大学概率及子女幸福感（Cui et al., 2019），本文参考 Fu et al. (2022) 和 Li et al. (2017) 的研究利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构建工具变量：

$$CEE_{pg} = \text{expan}_g \times \text{enrollshare1998}_p \quad (2)$$

CEE_{pg} 代表预计在第 g 年省份 p 参加高考的母亲所受到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潜在影响程度，由两项相乘得到。第一项 expan_g 为基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历年全国实际大学新生录取人数与潜在大学新生录取人数之间的差额。其中，如图2所示，潜在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计算过程如下：第一，对1990–1998年全国实际大学新生录取人数进行线性拟合，得到拟合系数；第二，根据拟合系数预测高考扩招政策实施后每年的全国潜在招生人数；第三，计算各年实际与潜在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差额，即为 expan_g 。由于实际扩招人数可能包含地方政府对扩招力度的调整，本文未使用每年实际扩招人数（Fu et al., 2022；Li et al., 2017）。

CEE_{pg} 的第二项为基于1999年《中国教育考试年鉴》计算的1998年各省份实际大学新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比例（%）（简称“招生份额”）。因此，本文所构建的工具变量代表了历年各省的潜在扩招数量。Fu et al. (2022) 和 Li et al.

(2017)指出,1998年招生人数在全国所占份额越高的省份($enrollshare_{1998_p}$ 越大),其在扩招政策实施前的潜在扩招能力也越强,扩招政策实施后该省考生上大学的概率更高。图3刻画了各省份在1998年、2000年和2012年大学新生录取人数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各省的高考录取人数呈增长趋势,且各省在扩招政策实施前、后的招生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种变化趋势表明,扩招政策实施前的地区招生份额能够在省级层面反映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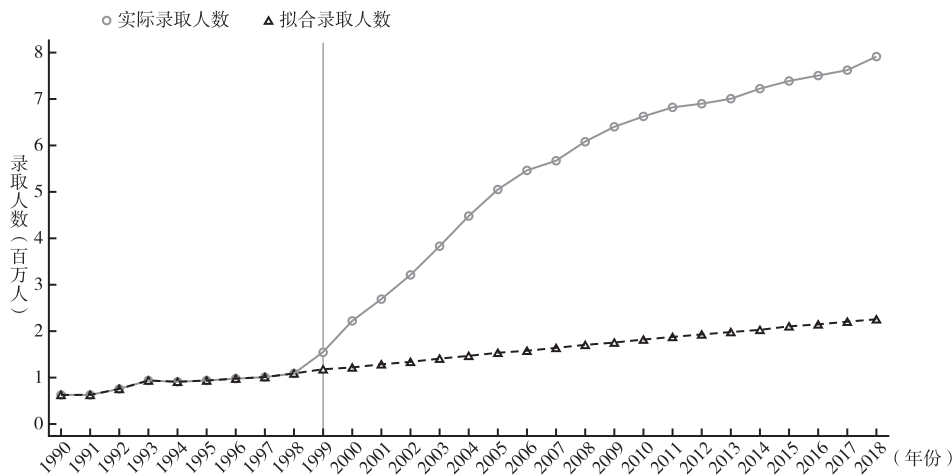


图2 全国高等教育扩招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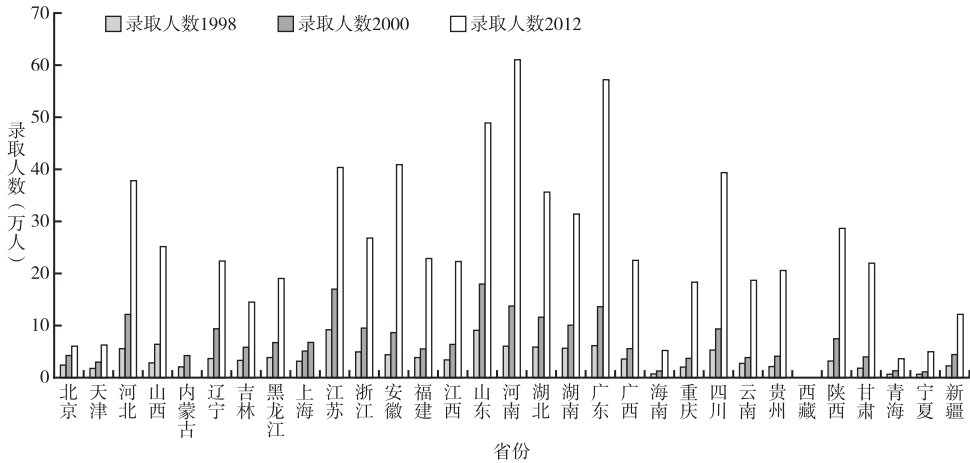


图3 1998年、2000年和2012年各省份大学新生录取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2001年和201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得到。

由于母亲学历为指示变量，本文采用Maddala（1983）的方法基于工具变量的TS-TEM模型解决母亲学历的内生选择问题^①。首先，使用Probit模型估计式（3），得到系数的估计值向量 $\hat{\sigma}$ ，并计算风险项 $\hat{\lambda}$ （逆米尔斯比）^②。其次，将 $\hat{\lambda}$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式（4）。系数 δ_1 即捕捉了本文所感兴趣的因果效应。

$$mhedu_{ikpgt} = 1(c_0 + c_1CEE_{pg} + X'_{ikpgt}\Gamma + \pi_k + \theta_p + \theta_p \times C_k + \omega_t + \mu_{ikpgt} > 0) \quad (3)$$

$$y_{ikpgtm} = \delta_0 + \delta_1 mhedu_{ikpgtm} + \tau \hat{\lambda}_{ikpgtm} + X'_{ikpgtm}\eta + \pi_k + \theta_p + \theta_p \times C_k + \omega_t + v_{ikpgtm} \quad (4)$$

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外生性依赖于如下假定：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前，对于在不同高考户籍地省份（潜在）参加高考的母亲，她们最终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平行的队列趋势。若上述平行趋势假定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在控制母亲出生年份及高考户籍地省份固定效应后，工具变量能够满足外生性条件。为了检验各省份控制组（在1999年以前（潜在）参加高考的母亲）上大学概率是否具有平行队列趋势，本文将式（3）改为以下动态形式：

$$mhedu_{ikpgt} = 1\left(\rho_0 + \sum_{s=1987, \neq 1998}^{2010} \rho_s enrollshare1998_s * D_s + X'_{ikpgt}\Theta + \pi_k + \theta_p + \theta_p \times C_k + \omega_t + \xi_{ikpgt} > 0\right) \quad (5)$$

其中， D_s 为高考年份指示变量。当母亲在第 s 年（潜在）参加高考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其他变量的定义同式（1）。式（5）中的主要交互项系数 ρ_s 即捕捉了各队列相对于基组（1998年参加高考）的高等教育扩招效应。图4描绘了交互项系数估计值的队列趋势。对于在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前（潜在）参加高考的母亲，交互项系数的估计值总体上不显著，表明扩招政策对她们上大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③。然而，对于（潜在）高考年份在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后的母亲，系数估计值呈现了先逐渐增大，进而平稳，而后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尽管自2006年显著水平逐渐降

① 根据Maddala（1983），在误差项（由模型（3）和模型（4）的误差项联合构成）服从二维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极大似然（maximum likelihood, ML）估计法能够得到有效且一致的估计量。而两步（two-step, TS）估计量的一致性仅需第一步模型（模型（3））的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因此较ML估计量更加稳健。此外，当模型中包含较多虚拟变量时，ML估计法常常无法收敛。为此，本文采用TS法估计主要结果。

② $\hat{\lambda} = \hat{\lambda}(z'\hat{\sigma}) = \phi(z'\hat{\sigma}) / (1 - \Phi(z'\hat{\sigma}))$ ， z 为一个由常数项、工具变量及模型（1）中所有外生解释变量构成的向量，其中 $\Phi(\cdot)$ 和 $\phi(\cdot)$ 分别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

③ 尽管个别控制组的相对扩招效应呈负向显著，例如（潜在）高考年份为1988年及1990-1993年的母亲，然而针对所有控制组系数估计值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统计量 $\chi^2 = 83.5$ （自举1500次， $p=0.287$ ）表明，平行趋势假定在总体上得到满足。

低^①，（潜在）高考年份为2001年及以后的母亲上大学概率整体上显著提高。上述结果表明平行趋势假定能够基本得到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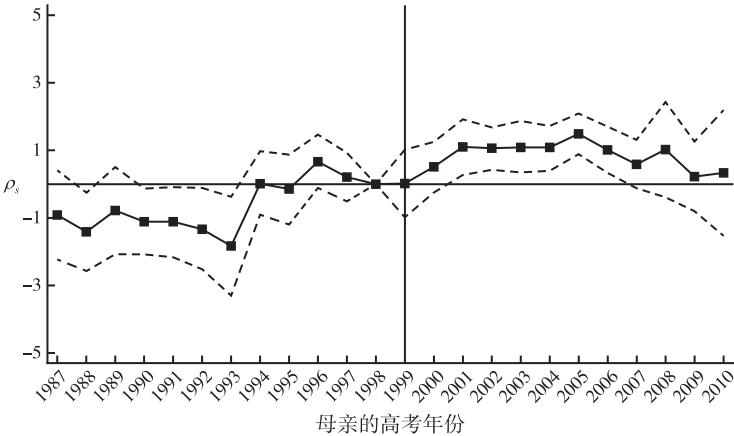


图4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队列效应

注：图中实线上的点为式（5）中交互项系数的估计值，上下两条虚线代表系数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得到。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2展示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影响。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10~15岁青少年的母亲上大学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考户籍地省份每多扩招1万人，能够提升母亲上大学概率0.7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的9.94%。表3同时报告了使用OLS（普通最小二乘）和TEM（处理效应模型）两种方法估计得到的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OLS估计结果（子表A）显示，无论使用幸福感的原始得分还是年龄标准化得分，母亲高学历对子女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子表B展示了TEM结果：

① 对于（潜在）高考年份为2006年及以后的母亲而言，系数估计值逐渐减小且变得不再显著，其可能原因有二：第一，为避免大学扩招规模增长过快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于2006年提出要将重点放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从而逐渐降低扩招力度；第二，随着高考年份逐渐接近2010年，样本量逐渐减少，导致估计效率有所降低。

无论是原始得分还是年龄标准化得分，TEM的估计值均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并未能有效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本文将上述不显著结果归因为同期政策或其他因素的干扰、不同特征群体呈现方向相反的代际溢出效应、存在方向相反的作用机制。针对上述三种原因，本文将逐一进行检验。

表2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母亲上大学概率的影响

	母亲是否上大学（是=1）
	(1)
CEE	0.007*** (0.001)
样本量	9973
结果变量均值	0.0704
第一步估计的F值	112.9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3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

	子女幸福感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1)	(2)
子表A：OLS		
母亲高学历	0.206** (0.086)	0.103*** (0.036)
样本量	7629	9973
结果变量均值	8.245	0.0197
子表B：TEM		
母亲高学历	-0.179 (0.288)	-0.049 (0.121)
样本量	7629	9973
结果变量均值	8.245	0.0197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排除来自同期政策或其他因素的干扰

本文首先排除同期政策干扰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第一，中国于1986年7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然而不同省份的具体实施时间存在差异（1986–1994年）。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母亲的出

生年份为1968–1990年，因此仅有部分母亲受到了《义务教育法》的影响。为排除《义务教育法》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Ma（2019）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了母亲受《义务教育法》影响的标准化年数。表4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在剔除《义务教育法》干扰后，母亲高学历的代际溢出效应仍然不显著^①。

第二，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同时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母亲上大学的概率也可能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此外，自1984年起，各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力度存在显著差异。若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强度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地区分布高度相关，基于式（3）的效应估计值将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干扰，进而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Ebenstein（2010）提供的历年各省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标准化强度指数。表4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并未改变本文的主要结果。

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放松了人口迁移限制，开启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浪潮。Zhou et al.（2014）指出，因父母进城打工而被迫留守农村的孩子往往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为了剔除人口迁移的影响，本文参考Cui et al.（2019）的设计，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各省份初始人口迁移率与母亲出生年份指示变量的交互项。表4第（5）列和第（6）列的结果表明，人口迁移并未改变基准回归结果。

第四，本文的研究周期覆盖了新冠疫情初期。为排除新冠疫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剔除了新冠疫情暴发后的数据（CFPS 2020年和2022年），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表4第（7）列和第（8）列的结果显示，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后主要结论并未改变。

表4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剔除同期政策干扰

	子女幸福感							
	义务教育法		独生子女政策		人口迁移		新冠疫情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1)	(2)	(3)	(4)	(5)	(6)	(7)	(8)
母亲高学历	-0.165 (0.286)	-0.039 (0.121)	-0.211 (0.297)	-0.068 (0.116)	-0.277 (0.282)	-0.061 (0.119)	-0.189 (0.277)	-0.030 (0.108)
样本量	7628	9972	7629	9973	7574	9899	4171	6515
结果变量均值	8.245	0.0197	8.245	0.0197	8.248	0.0208	8.250	0.0269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① 由于CFPS未提供母亲接受义务教育时期所在省份信息，本文以母亲出生地省份作为代理。

（三）子女性别异质性

Cui et al.（2019）研究发现，受“重男轻女”观念及“模范效应”影响，母亲学历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女孩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本文的框架下，母亲高学历对男孩和女孩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性别异质性。为此，本文分别分析母亲高学历对男孩和女孩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表5的结果显示，子女性别异质性同样未能较好地解释基准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

表5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性别异质性

	子女幸福感			
	男孩		女孩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原始得分	年龄标准化得分
	(1)	(2)	(3)	(4)
母亲高学历	-0.644 (0.397)	-0.123 (0.155)	0.221 (0.380)	0.007 (0.160)
样本量	4065	5235	3564	4738
结果变量均值	8.141	-0.0335	8.364	0.0785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四）机制分析

1. 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检验母亲高学历背景是否显著改善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本文考察了以下四方面指标：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支出（包括家庭人均总支出、人均食品支出、人均文化娱乐支出、人均旅游支出和孩均教育培训支出）、家庭资源（子女是否拥有城镇户口）以及子女的营养状况（是否体重偏轻）。同时考察家庭人均收入和支出是因为消费比收入更能反映家庭生活质量。子女的户口性质与其能否享受本地公立学校和医疗资源密切相关（Cui et al., 2019）。子女营养状况则是反映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维度。

表6结果显示，母亲高学历显著提高了家庭人均纯收入。从各项家庭支出来看，除家庭人均食品支出未显著增加外，母亲高学历对家庭人均文化娱乐、旅游及孩均教育培训支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6第（10）列和第（11）列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母亲高学历还有助于子女享受本地公共资源，并改善子女的营养状况。

2. 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

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直接影响了青少年子女的学习兴趣、体验感和效率。母亲的高学历背景是否有效改善了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进而提升了青少年子女的幸福

感？关于家庭教育环境，本文首先参考 Cui et al.（2019）的做法定义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其次，本文对 CFPS 提供的家长对待孩子的以下五种行为的频率得分进行加总，用以刻画代际互动质量：“和孩子说话时很和气”、“喜欢和孩子说话”、“喜欢和孩子一起玩乐”、“表扬孩子”和“批评孩子”^①。得分越高代表代际互动质量越高。关于家庭教育模式，本文参考吴贾等（2020），考察家长对子女的“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及当子女成绩未达到预期时家长是否采取正面的处理方式。表7结果显示，高学历母亲更重视青少年子女的教育，代际互动质量得以显著提升，高学历母亲也具有更高的“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因此，从营造良好教育环境、科学选择教育模式的角度来看，母亲的高学历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提高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幸福感。

表6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

	家庭人 均纯 收入	家庭人均支出								子女 城镇 户口	子女营 养状况
		总支出	食品 支出	文化娱乐支出		旅游支出		孩均教育 培训支出			
				是否 支出	支出 金额	是否 支出	支出 金额	是否 支出	支出 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母亲高学历	0.346** (0.161)	0.412*** (0.129)	0.134 (0.145)	0.069 (0.063)	0.399** (0.197)	0.225*** (0.080)	0.778** (0.304)	0.081** (0.033)	0.694*** (0.173)	0.221*** (0.066)	-0.158** (0.070)
样本量	9923	7608	9799	9939	3635	7613	1784	10101	9304	8283	9828
结果变量均值	8.938	9.336	7.857	0.366	4.563	0.234	5.809	0.921	7.304	0.189	0.611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收入和支出变量均做对数化处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7 母亲高学历对家庭教育环境和教育模式的影响

	家庭教育环境		家庭教育模式	
	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	代际互动质量	年龄标准化的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	孩子成绩不理想时家长采取正面的处理方式
	(1)	(2)	(3)	(4)
母亲高学历	2.360*** (0.738)	1.323** (0.581)	0.374** (0.190)	-0.073 (0.050)
样本量	4728	3396	3388	5861
结果变量均值	17.72	16.16	0.0247	0.865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① 每个问题的选项为“从不”、“极少”、“有时”、“经常”和“总是”，分别赋值为1~5分。其中，“批评孩子”的频率得分已调整为反向计分。

3. 家庭教育期望与孩子的学习压力

子女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是母亲高学历负向代际溢出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高学历父母对其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但教育期望只有在超过某一阈值时才会转化为过高的学业目标，进而降低子女的幸福感（Ang et al., 2009; Lu et al., 2021）。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由母亲高学历背景所引致的教育期望是否已超过该阈值尚不得而知。因此，本文进一步基于子女参加各类课外辅导班的情况、工作日或周末日均学习时长、睡眠状况、自评学习压力及健康水平，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考察母亲高学历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首先，本文定义了四个指示变量，用以分别代表子女是否在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参加了学校课程类、竞赛类、才艺类及心智开发类课外辅导班或家教。对于参加了课外辅导或家教的子女，本文进一步考察其周总课时是否过长及相应的课外培训总支出^①。表8结果显示，高学历母亲更倾向于为子女投资艺术类培训项目，而子女参与文化类或竞赛类课外辅导班的概率并未显著提高。同时，母亲高学历也未显著增加子女参加课外培训的时长。

以上结果表明，高学历母亲并未安排子女参加过高强度的非才艺类课外辅导课程。但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高学历母亲没有为其子女安排此类课外辅导。数据显示，高、低学历母亲子女参加学校课程类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为33.1%和12.3%，参加竞赛类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为3.4%和0.8%，参加心智开发类课外辅导的概率分别为0.5%和0.3%。因此，受“全面发展教育倾向”的影响，高学历母亲子女在参加非才艺类课外辅导班的同时更多地增报了才艺培训班。这种主观教育倾向导致的“被动植入式”教育使青少年子女产生不良情绪，不利于其在成长阶段获得幸福感。

其次，充足的睡眠和必要的娱乐和社交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参加文化类与才艺类培训课程会挤占青少年子女日常休息和娱乐时间。因此。检验上述“挤出效应”是否存在将有助于更好地度量子女面临的学习压力。本文定义了五个指示变量，分别指代子女在非周末、周末的日均学习时长是否过长、日常睡觉时间是否过晚以及在非周末、周末的日均社交娱乐时长是否较短。教育部规定，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在周一至周五的日均在校学习时长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和8小时，而日均作业时间分别不得超过1小时、1.5小时和2.5小时。同时，教育部也建议中小學生

① 本文将每周课外辅导班或家教总课时超过8小时视为课时过长，课外培训支出以对数值表示。

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日均课外辅导时长不超过4小时。据此，本文将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在非周末的日均学习时长分别超过7小时、8.5小时和10.5小时视为“非周末日均学习时间过长”，而将周末日均学习时长分别超过5小时、5.5小时和6.5小时视为“周末日均学习时间过长”。对于孩子是否睡觉过晚，本文将日常睡觉时间晚于21:30的10~12岁孩子和晚于23:00的13~18岁孩子视为“晚睡”^①。本文根据CFPS 2010年时间利用表中非周末及周末的日均社交娱乐时长中位数，定义子女在非周末及周末的日均社交娱乐时间是否较短。表8第（7）列至第（11）列的结果显示，母亲高学历虽然未显著增加子女非周末日均学习时长，却显著增加了周末日均学习时长。同时，高学历母亲子女晚睡的概率更大，非周末社交娱乐时间更短。

为更准确地刻画子女的学习压力，本文进一步考察青少年标准化自评学习压力^②。表8第（12）列的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增加了青少年子女的自评学习压力（约0.2个标准差），并且系数估计值接近10%水平显著（ $t = 0.207/0.140 = 1.48$ ）。

表8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及学习压力的影响

	课外辅导或家教						孩子的学习、睡眠和玩耍时长					教育阶段 标准化自评 学习压力
	参加学校课程的辅导或家教	参加竞赛辅导或家教	参加才艺培养班	参加心智开发班	周课外辅导或家教总时长过长	过去一年课外辅导或家教支出总金额	日均学习时间过长		晚上睡觉时间过晚	日均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时间较短		
							非周末	周末		非周末	周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母亲高学历	0.059 (0.070)	0.002 (0.024)	0.153** (0.059)	-0.018 (0.012)	0.100 (0.110)	0.465* (0.239)	0.090 (0.077)	0.133** (0.066)	0.136* (0.075)	0.162* (0.084)	0.074 (0.090)	0.207 (0.142)
样本量	7846	7867	7869	7868	2753	2764	7300	7298	7733	2348	2348	9851
结果变量均值	0.139	0.00966	0.0652	0.00318	0.389	7.373	0.567	0.200	0.309	0.507	0.497	-0.0246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和5%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较大的学习压力也会体现在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因此，本文还借助子女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反映其是否面临过大的学习压力，其中生理健康指标包括自评健康

① “晚睡”的具体标准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对不同年龄段儿童最低睡眠时长要求设定的。
② 自评学习压力得分为1~5分，分值越高，代表学习压力越大。鉴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孩子通常面临不同的学习压力，本文对该得分在不同教育阶段内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非常健康”、“很健康”或“比较健康”=1）、孩子是否在过去一个月内生过病以及是否在过去一年内因病住过院。关于心理健康指标的构建，本文结合使用凯斯勒心理疾患量表（K6）（CFPS 2010年和2014年）及中心抑郁量表（CES-D 20）（CFPS 2018年、2020年和2022年）得分构建了“孩子是否抑郁”变量^①。表9的估计结果表明，母亲高学历虽然未增加子女住院或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但显著降低了子女的自评健康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其在过去一个月生病的概率。

上述结果共同表明，基准结果中代际溢出效应不显著，是由于母亲高学历背景增加了子女的学习压力，进而抵消了物质条件、教育环境及教育模式改善对幸福感的正向提升效应。

表9 母亲高学历对青少年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自评健康	过去一个月生过病	过去一年住过院	孩子精神抑郁
	(1)	(2)	(3)	(4)
母亲高学历	-0.056** (0.028)	0.160*** (0.056)	0.037 (0.034)	0.051 (0.055)
样本量	7752	10074	7306	9927
结果变量均值	0.960	0.177	0.0491	0.219

注：括号中为自举500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4. 家庭氛围的和谐度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了过高的家庭教育期望，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影响也受夫妻关系和家庭氛围的影响。因此，本文定义了以下三个指示变量：过去一个月父母之间是否有过争吵、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有过争吵以及父母是否离异。如表10所示，母亲高学历虽未显著影响父母婚姻的稳定性，但增加了父母之间和代际之间的争吵概率，且前者的系数估计值接近10%水平显著（ $t = 0.097/0.068 = 1.43$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母亲高学历所引致的家庭不和谐因素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负向的代际溢出效应。

^① 临床上K6>4或CES-D>15被视为有抑郁倾向（Kessler et al., 2002; Prochaska et al., 2012; Radloff, 1991）。

表 10 母亲高学历对家庭氛围的影响

	过去一个月父母之间 有过争吵	过去一个月代际之间 有过争吵	父母离异
	(1)	(2)	(3)
母亲高学历	0.097 (0.064)	0.046 (0.066)	0.009 (0.032)
样本量	9557	9910	10369
结果变量均值	0.253	0.349	0.0201

注：括号中为自举 500 次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 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5. 代际陪伴时间

表 7 的结果表明，高学历母亲与子女之间往往有着更频繁、更高质量的代际互动，但母亲陪伴时间的长短同样重要。如果母亲陪伴时间较为有限，子女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为检验母亲高学历是否减少了代际陪伴时间，本文考察了“子女是否留守”和“子女是否主要由母亲照管”两个维度。具体而言，本文使用过去一年子女与其母亲、父亲的同住时长是否不足 5 个月来衡量留守情况。表 11 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显示，母亲的高学历背景并未显著影响子女的留守概率。

关于“子女是否主要由母亲照管”，本文区分白天（CFPS 2014 年和 2018 年）和晚上（CFPS 2014 年、2018 年、2020 年和 2022 年）两种情况。如表 11 第（3）列和第（4）列所示，高学历背景显著降低了母亲白天陪伴子女的概率，但并未显著影响母亲晚上陪伴子女的概率。为统一分析口径，本文同样使用 CFPS 2014 年和 2018 年两期数据考察母亲高学历对“孩子晚上是否主要由母亲照管”的影响，分析结果并未因此改变（见表 11 第（5）列）。

表 11 母亲高学历对代际陪伴时间的影响

	留守儿童		子女主要由母亲照管		
	过去一年子女与 母亲同住时间 不足 5 个月	过去一年子女与 父亲同住时间 不足 5 个月	白天 (CFPS 2014、 2018)	晚上 (CFPS 2014、2018、 2020、2022)	晚上 (CFPS 2014、 2018)
	(1)	(2)	(3)	(4)	(5)
母亲高学历	0.054 (0.052)	0.013 (0.074)	-0.157** (0.080)	-0.057 (0.076)	-0.008 (0.079)
样本量	7715	7687	4388	7727	4376
结果变量均值	0.234	0.362	0.332	0.459	0.424

注：括号中为自举 500 次标准误；**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22 年数据和《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1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外生性，实证研究了母亲受教育水平对青少年子女幸福感的代际溢出效应。在中国现行“教育军备竞赛”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上述研究及相应的机制分析从家庭内部视角，为当前青少年幸福感缺失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实证解释。这对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幸福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母亲高学历并未显著提升青少年子女的幸福感，并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与机制分析显示，高学历的母亲能够显著提高青少年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其所面临的家庭教育环境和模式，但母亲的高学历背景也给予子女带来过大的学习压力，抵消了正向的幸福感提升效应。此外，代际陪伴的减少也是母亲高学历背景未能提高子女幸福感的潜在原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持续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具有重要意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有助于个体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还能够在物质资源积累、家庭教育环境建设及教育模式选择等方面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为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提供坚实基础。因此，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与推进有望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

其次，深化“双减”政策改革并加强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尽管母亲的高学历背景能够有效提升子女的物质福利、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并优化家庭教育模式，但高学历背景未必能够直接提升子女主观幸福感。本文研究表明，导致这一代际“教育-幸福”悖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学历背景所引发的过高家庭教育期望。不可忽视的是，高学历背景所带来的过高教育期望，除了源自高学历家庭的教育期望外，当前激烈的升学竞争格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幸福感缺失问题，弱化“教育军备竞赛”至关重要。而深化“双减”政策和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是行之有效的突破口。具体而言，政府应坚持落实并进一步巩固“双减”政策。一方面，通过提高学校和教师的作业管理、课后服务及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引导家庭合理选择校外培训课程，科学规划培训时间。此外，政府还应加快优质高中与大学的建设，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而有效削弱“高学历父辈-过高教育期望”这一代际传递动机，帮助青少年脱离激烈的“升学漩涡”，实现“知识-幸福”的双赢局面。

最后，鉴于代际陪伴时间的减少是母亲高学历背景未能有效转化为子代主观幸福感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可行的对策。首先,应创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单位和企业实施弹性工作制、推进远程办公的合法化,探索建立“家庭时间账户”制度,使员工能够将加班时间转换为家庭时间,从而提高陪伴的灵活性。其次,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尝试将“家庭关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提高青少年对家庭沟通与情绪管理重要性的认知;同时,延长课后服务时间,通过“教师与同学的陪伴”适度弥补“家庭陪伴”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为家长提供“科学育儿工作坊”,帮助其打破“物质替代陪伴”的认知误区。

参考文献:

- 杜凤莲、赵云霞、钟森丽 (2023),《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劳动经济研究》第3期,第54-74页。
- 刘生龙、胡鞍钢 (2018),《大学教育回报:基于大学扩招的自然实验》,《劳动经济研究》第4期,第48-70页。
- 刘杨、蔡宏波 (2020),《父代特征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代际趋势》,《劳动经济研究》第3期,第77-96页。
- 石智雷、宁桃丽 (2024),《女性地位、家庭决策与农民工子女留守》,《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第82-97页。
- 吴贾、林嘉达、韩潇 (2020),《父母耐心程度、教育方式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学动态》第8期,第37-53页。
- 张川川、葛润 (2024),《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两个自然实验的估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第26-47页。
- 张抗私、史策 (2020),《高等教育、个人能力与就业质量》,《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98-112页。
- 周子焜、雷晓燕、沈艳 (2023),《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841-859页。
- Akaeda, Naoki (2020). Contextual Social Trust and Well-Being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1 (8), 2957-2979.
- Akee, Randall, William Copeland, Jane Costello & Emilia Simeonova (2018). How Does Household Income Affect Chil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American Economic*

- Review*, 108 (3), 775–827.
- Almond, Douglas, Janet Currie & Valentina Duque (2018). Childhood Circumstances and Adult Outcomes: Act II.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6 (4), 1360–1446.
- Amato, Paul (2010). Research on Divorce: Continu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 (3), 650–666.
- Amato, Paul & Tamara Afifi (2006). Feeling Caught Between Parents: Adult Children's Relations with Par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1), 222–235.
- Ang, Rebecca, Robert Klassen, Wan Har Chong, Vivien Huan, Isabella Wong, Lay See Yeo & Lindsey Krawchuk (2009). Cross-Cultural Invariance of the Academic Expectations Stress Inventory: Adolescent Samples from Canad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2 (5), 1225–1237.
- Angelini, Viola, Laura Casi & Luca Corazzini (2015). Life Satisfaction of Immigrants: Does Cultural Assimilation Matte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8 (3), 817–844.
- Becker, Gary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gman, Manfred Max & Jacqueline Scott (2001). Young Adolescents' Wellbeing and Health-Risk Behaviours: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4 (2), 183–197.
- Black, Sandra, Paul Devereux & Kjell Salvanes (2005). 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1), 437–449.
- Bursztyn, Leonardo, Stefano Fiorin, Daniel Gottlieb & Martin Kanz (2019). Moral Incentives in Credit Card Debt Repaymen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4), 1641–1683.
- Calarco, Jessica McCrory (2018). *Negotiating Opportunities: How the Middle Class Secures Advantages in Schoo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neiro, Pedro, James Heckman & Edward Vytlacil (2011). Estimating Marginal Returns to Edu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6), 2754–2781.
- Cesarini, David, Erik Lindqvist, Robert Östling & Björn Wallace (2016). Wealth, Health, and Chil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dministrative Data on Swedish Lottery Play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2), 687–738.

- Chang, Fang, Yuxi Jiang, Prashant Loyalka, James Chu, Yaojiang Shi, Annie Osborn & Scott Rozelle (2019). Parental Migrati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4, 337–349.
- Coleman, Jame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 Cuartas, Jorge (2022). The Effect of Maternal Education on Parenting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6 (2), 280–290.
- Cui, Ying, Hong Liu & Liqiu Zhao (2019). Mother's Educ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Compulsory School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7 (3), 669–692.
- Cui, Ying, Hong Liu & Liqiu Zhao (2021). Protective Effect of Adult Children's Education on Parental Survival in China: Gender Difference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77, 113908.
- Currie, Janet & Douglas Almond (2011).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before Age Five. In David Card & Orley Ashenfelter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ume 4B)*. Amsterdam: Elsevier, pp. 1315–1486.
- Daly, Kerry (2001). Deconstructing Family Time: From Ideology to Lived Experi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 (2), 283–294.
- Davis, Shannon & Theodore Greenstein (2009). Gender Ideology: Components,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 (1), 87–105.
- Diener, Ed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3), 542–575.
- Dursun, Bahadır & Resul Cesur (2016). Transforming Lives: The Impact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on Hope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9 (3), 911–956.
- Ebenstein, Avraham (2010).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5 (1), 87–115.
- Frey, Bruno & Alois Stutzer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2), 402–435.
- Fu, Hongqiao, Run Ge, Jialin Huang & Xinzheng Shi (2022).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th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72, 101768.

- Ge, Ting (2017).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5 (8), 1118–1127.
- Gillham, Jane, Zoe Adams-Deutsch, Jaclyn Werner, Karen Reivich, Virginia Coulter-Heindl, Mark Linkins, Breanna Winder, Christopher Peterson, Nansook Park, Rachel Abenavoli, Angelica Contero & Martin Seligman (2011). Character Strengths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Adolescenc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6 (1), 31–44.
- Graham, Carol & Milena Nikolova (2015). Bentham or Aristotl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ld Development*, 68, 163–179.
- Grossman, Michael (2000).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In Anthony Culyer & Joseph Newhouse (eds.),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Volume 1A)*. Amsterdam: Elsevier, pp. 347–408.
- Gu, Xiaorong (2021). Introduction: The Value of Childre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Asia.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4 (2), 477–486.
- Harding, Jessica, Pamela Morris & Diane Hughes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Academic Outcom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 (1), 60–76.
- Harmon, Colm & Ian Walker (1995). 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Return to Schooling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5), 1278–1286.
- Hoem, Jan (1997). Educational Gradients in Divorce Risks in Sweden in Recent Decades. *Population Studies*, 51 (1), 19–27.
- Holmlund, Helena, Mikael Lindahl & Erik Plug (2011). The Causal Effect of Parents' Schooling on Children's Schooling: A Comparison of Estimation Metho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3), 615–651.
- Kansky, Jessica, Joseph Allen & Ed Diener (2016). Early Adolescent Affect Predicts Later Life Outcomes.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8 (2), 192–212.
- Kessler, Ronald, Gavin Andrews, Lisa Colpe, Eva Hiripi, Daniel Mroczek, Sharon-Lise Normand, Ellen Walters & Alan Zaslavsky (2002). Short Screening Scales to Monitor Population Prevalences and Trends in Non-Specific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2 (6), 959–976.
- Li, Hongbin, Yueyuan Ma, Lingsheng Meng, Xue Qiao & Xinzheng Shi (2017). Skill

- Complementarities and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6, 10–26.
- Li, Jiaxin, Shan Cai, Yunfei Liu, Jiajia Dang, Di Shi, Ziyue Chen, Yihang Zhang, Tianyu Huang, Haoyu Zhou, Peijin Hu, Jun Ma & Yi Song (2024). Mapping Adolescent Mental Well-Being – 30 PLADs, China, 2019. *China CDC Weekly*, 6 (29), 703–707.
- Liu, Weiguang (2018). Inefficient Signalling, Education Arms Race and Education Inflation in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and Finance*, 5 (6), 61–75.
- Lu, Haiyang, Peng Nie & Alfonso Sousa-Poza (2021). The Effect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n Adolesc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Academic Pressure: Longitudinal Evidence for China.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4 (1), 117–137.
- Lundberg, Shelly & Robert Pollak (1996). Bargaining and Distribution in Marri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4), 139–158.
- Lundborg, Petter, Anton Nilsson & Dan-Olof Rooth (2014). Parental Education and Offspring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Compulsory School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6 (1), 253–278.
- Lyubomirsky, Sonja, Laura King & Ed Diener (2005).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6), 803–855.
- Ma, Mingming (2019). Does Children's Education Matter for Parents' Health and Cogn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66, 222–240.
- Maddala, Gangadharrao (1983).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ks, Nadine & James David Lambert (1998). Marital Status Continuity and Change Among Young and Midlife Adults: Longitudinal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 (6), 652–686.
- Oreopoulos, Philip, Marianne Page & Ann Huff Stevens (2006).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 (4), 729–760.
- Prochaska, Judith, Hai-Yen Sung, Wendy Max, Yanling Shi & Michael Ong (2012). Validity Study of the K6 Scale as a Measure of Moderate Mental Distress Based on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Need and Uti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s in Psychiatric Research*, 21 (2), 88–97.

- Proctor, Carmel, Alex Linley & John Maltby (2009). Youth Life Satisfa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 (5), 583–630.
- Radloff, Lenore Sawyer (1991). The Use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 (2), 149–166.
- Ren, Qianping, Liyan Wang & Maoliang Ye (2025). Long-Term Impacts of Early Advers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Great Famin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30, 106905.
- Sayer, Liana, Anne Gauthier & Frank Furstenberg (2004).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Parents' Time with Children: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5), 1152–1169.
- Schwartz, Christine & Hongyun Han (2014). The Reversal of the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Trends in Marital Diss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4), 605–629.
- Suldo, Shannon, Amanda Thalji-Raitano, Michelle Hasemeyer, Cheryl Gelley & Brenna Hoy (2013). Understan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Does School Climate Matter?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8 (2), 169–182.
- Sun, Jiandong, Michael Dunne, Xiang-Yu Hou & Ai-Qiang Xu (2013). Educational Stres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Peer Influences. *Educational Review*, 65 (3), 284–302.
- Vanassche, Sofie, Gray Swicegood & Koen Matthijs (2013). Marriage and Children as a Key to Happines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and Children on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 (2), 501–524.
- Wan, Yinmei (2006). Expans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98: Its Causes and Outcome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7 (1), 19–32.
- Wang, Chun, Pei Zhang & Ning Zhang (2020).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China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5 (12), e637.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23). *Global Accelerated Action for the Health of Adolescents (AA-HA!): Guidance to Support Country Implementation (2nd e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u, Wenjie (2015). Rail Acc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Quality of Life Survey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3 (2), 456–470.
- Zhang, Xiao (2012).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Family Income on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Environ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mily Process*, 51 (4), 483-497.

Zhong, Hai (2015). Does a College Education Cause Better Health and Health Behaviours? *Applied Economics*, 47 (7), 639-653.

Zhou, Minhui, Rachel Murphy & Ran Tao (2014). Effects of Parents' Migra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 (2), 273-292.

Maternal Education and Adolesc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Wu Linlin¹ & Xu Ruofei²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¹;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²)

Abstract: The decline in adolescent well-being has become a growing public concer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matern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dolescent children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mother's higher education does not significantly enhance her adolescent children's well-being.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while higher maternal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hildren's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arenting styles, these positive effects are counteracted. The subjective educational pre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highly educated mothers, specifically a strong emphasi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ll-around development, impose considerable academic pressure on adolescents. Furthermore, the reduction in time mothers spend with their children is identified as an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adolescents' diminished sense of well-being.

Keywords: mater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dolescent children, subjective well-being

JEL Classification: I23, I31, I38, J13

(责任编辑: 马 超)